

海洋文化视角下的长岛渔号音乐形态与社会功能变迁

蒋方舟¹, 张依宁²

(1. 曼谷吞武里大学 音乐学院, 泰国 曼谷 10170;

2. 衢州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 浙江 衢州 324000)

摘要:长岛渔号“应浪合桨”的节奏、“一领众和”的结构等音乐本体特征与其海洋劳动场域为同构关系。随着渔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变革,长岛渔号的核心功能从协调指挥劳动、激发动力的“海上号令”,逐渐转向承担文化标识、艺术审美、教育传承及旅游经济等象征性功能的“舞台非遗”。这一功能转型深刻揭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适应性与调适路径,为其活态传承提供了有益的学术思考。

关键词:海洋文化视角;长岛渔号;音乐形态;社会功能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26)01-0035-07

收稿日期:2025-12-01

作者简介:1. 蒋方舟(1992-),男,山东淄博人,曼谷吞武里大学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

2. 张依宁(1993-),女,吉林通化人,衢州学院教师教育学院讲师,哲学博士。

当前,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普及,许多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边缘化甚至消失的风险。在这一背景下,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已成为时代的重要需求。长岛渔号作为山东海洋文化的典型代表,于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意义。

渔号子作为劳动歌谣的一种特殊类型,其音乐形态与社会功能深受海洋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的影响。通过分析长岛渔号与海洋文化的关系,可以深化对音乐与社会、环境互动关系的认知,为民族音乐学与文化生态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素材。随着现代渔业技术的发展,长岛渔号的原始功能逐渐弱化,其传承面临严峻挑战。通过系统梳理其历史变迁与当代价值,本研究可为其保护策略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促进这一非遗项目在当代社会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关于中国渔号子音乐的整体研究,已有学者从音乐学、民俗学等角度进行了初步探索,主要集中在号子的分类、音乐特征及其与社会劳动的关系等方面。这些研究为渔号子的学术定位奠定了基础,但多侧重于宏观论述,缺乏对区域个案的深挖。在山东及长岛地区民歌与非遗音乐的研究中,学者们对胶东半岛的海洋音乐文化给予了较多关注,但对长岛渔号的专门性研究仍显不足。现有成果多集中于音乐本体的描述性分析,未能全面揭示其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动态关联。

关于音乐与社会功能、文化生态关系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已提出若干理论框架,强调音乐作为一种文化实践与社会结构和生态环境的密切关系。然而,将这些理论应用于海洋民俗音乐的研究尚不充分,尤其是对长岛渔号这样一种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的音乐形式的探讨仍有待深入。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在长岛渔号的专题性、系统性方面存在不足,多停留在静态描述而缺乏历史性视角。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引入海洋文化的整体视角,将长岛渔号置于其特定的自然与人文生境中,系统梳理其音乐形态与社会功能的动态变迁过程,从而弥补现有研究的空白。

一、海洋文化——长岛渔号的生成土壤

(一) 长岛区域概况与海洋生计模式

长岛,古称庙岛群岛,宛如一串璀璨的珍珠散落在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之间的渤海海峡。其由32个

大小岛屿组成,构成华北海域的天然屏障,素有“海上仙山”之美誉。这片群岛四面环海,无地不临水,无岛不迎风,其地理环境被赋予了深刻的海洋属性。岛陆面积狭小,土壤贫瘠,农耕条件受限,而广阔的海域则蕴藏着丰富的鱼虾资源。这种独特的地理格局,从根本上决定了当地居民“靠海吃海”的生存模式,将他们的生活、生计乃至命运与变幻莫测的海洋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一切文化活动皆由此生发。

纵观历史,长岛的战略地位与渔业传统交织并行。它不仅是环渤海渔场的重要枢纽,更是历代海上漕运与军事防御的关键通道。早在秦汉时期,这里便是寻仙求药的方士往来的海上要冲;至唐宋,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明清以来,更是京津的海上门户与军事要塞,素有“渤海锁钥”之称。然而,无论是作为要塞还是航道,其深厚的渔业根基从未动摇。世代岛民以海为田,舟楫为马,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这片海域既是保卫家园的战场,更是哺育生命的粮仓,塑造了岛民既骁勇又豁达、既敬畏自然又勇于开拓的独特海洋性格^①。

传统的渔业生产是长岛人生计的核心,这是一种高度依赖集体协作的劳作方式。在机械化渔船尚未普及的年代,渔民们依靠木帆船对抗风浪,每一项关键作业都需众人齐心合力方能完成。摇橹需步调一致以提供动力;撒网需默契配合以确保网具充分展开;起锚、起网(捞鱼)更是需要与海浪和鱼群的角力中爆发集体的力量。正是这种高强度、高风险的集体性海上劳作,成为长岛渔号诞生的直接催化剂。号子,不仅是劳动的伴奏,更是协调动作、统一节奏、激发潜能、保障安全的生产工具,是海上生产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 海洋文化的精神内核

长岛渔号粗砺而激昂的声响,绝非单纯的劳动指令,其灵魂深植于胶东渔民独特的海洋文化精神内核之中。首先体现为对海洋的敬畏与祈福。面对喜怒无常、浩瀚无垠的大海,先民深知自身渺小,从而孕育出深厚的海神信仰体系。无论是普济慈航的妈祖,还是掌控风雨的龙王,都是渔民精神寄托的核心。出海前的祭祀、丰收后的酬神,以及春节期间声势浩大的“渔灯节”等仪式活动,无不旨在祈求风平浪静、鱼虾满舱、人船平安。这种源自生存本能的神灵崇拜,内化为一种庄重的仪式感,使得出海作业不仅是物质生产,更是一场与自然神灵沟通的庄严仪式,为渔号注入了超越现实功用的神圣性^②。

其次,高风险、高强度的海洋作业催生了渔民之间高度强化的协作与共同体意识。一叶扁舟飘摇于风涛之中,个体的存亡与集体的命运紧密捆绑。每一次拉网、每一次摇橹,都需要所有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任何细微的差错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深刻地塑造了渔民的集体主义精神。他们不仅是劳作上的伙伴,更是生死与共的兄弟。长岛渔号“一领众和”的演唱形式,正是这种精神最直观的音乐化身:“号头”的引领如同船长指挥,众人的应和则是整齐划一的行动,声音的融合象征着力量的凝聚,在嘹亮的号子声中,个体被紧密地编织成一个高效、团结的战斗集体,共同对抗大海的险阻。

最终,这一切凝结为渔民坚韧与乐观的豁达人生态度。海洋既意味着危险与艰辛,也孕育着希望与收获。长期的搏击风浪,练就了渔民不畏艰难、吃苦耐劳的坚韧品格。而这种坚韧,并非沉重的枷锁,反而以一种达观的精神得以释放。他们习惯用最直白、甚至带有诙谐色彩的号子词来调侃劳动的辛苦,抒发对归家的渴望和对丰收的期盼。渔号中高亢明亮的音调,既是发力时的呐喊,也是面对茫茫大海时不屈的生命宣言^③。这种深植于骨子里的乐观精神,使他们能够坦然接受海洋的馈赠与剥夺,将惊心动魄的搏斗化为充满力量与韵律的歌,体现了人类在严峻自然条件下顽强的生命张力和精神超越。

长岛渔号的生成绝非偶然,它是长岛独特的海洋自然与人文环境共同锻造出的必然文化产物。其深植于险峻而富饶的海洋地理环境、依海而生的传统生计模式,以及由此孕育出的深沉海洋精神内核之中。本章的分析表明,渔号并非外在于渔民生活的艺术形式,而是其海上劳作生命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诞生,直接回应了征服海洋、集体协作、精神慰藉等最根本的生存需求。因此,理解长岛渔号,必

①吴静寅:《“长岛渔号”之发展探析》,《中国文艺家》2017年第10期。

②高洁:《山东长岛渔号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③肖建红、李万紫、王飞、王敏:《基于选择实验和陈述属性不出席的旅游资源非市场价值研究——以“长岛渔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旅游科学》2024年第10期。

须首先将其置于这片波澜壮阔的“海洋文化生境”之中，唯此方能真正领悟其每一个音符、每一声呼喊背后所承载的历史重量与文化深度。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的长岛渔号远超越了简单的“劳动歌曲”范畴，它本质上是渔民的“海上劳作生命线”。这条“生命线”是多重维度的，在物质层面，它是协调动作、统一节奏、保障生产安全与效率的核心技术工具，直接关系到作业的成败与船员的安危；在社会层面，它是编织共同体、凝聚人心、强化集体主义精神的社会组织纽带；在精神层面，它又是宣泄情感、祈愿平安、对抗自然伟力的心灵庇护所。这三重功能交织互构，使得渔号如同空气和海水一样，渗透在传统渔业生产的每一个环节，成为维系整个海上生产活动得以安全、高效、有序进行的生命线，奠定了其一切音乐形态与功能变迁的历史原点和逻辑起点。

二、应潮而歌——传统长岛渔号的音乐形态分析

（一）长岛渔号的分类与代表性曲目

传统长岛渔号的音乐形态与其具体的海洋生产劳动环节紧密嵌合，不同的作业场景催生了功能各异、音乐特征迥然的号子类型。根据劳作环节，其分类极具针对性：上网号用于将沉重的渔网拖拽上船，要求短促的爆发力；竖桅号出现在升起船帆桅杆的过程中，需要稳定而持续的力量；摇橹号是航行中推动船只前进的节奏核心，律动均匀而循环；掌篷号（或称“撑篷号”）专用于调整船帆角度以借助风势，动作与风力互动，充满变化；而发财号则是在鱼汛旺盛、丰收在望时所唱，情绪热烈欢庆。这种按劳动程序进行的精细分类，本身就是渔号音乐实用性的直接体现，每一种号子都是特定生产动作的音响化指令与动力源泉。

对这些特定曲目的分析能更深刻地揭示其音乐形态与劳动的对应关系。例如，《上网号》的结构极为短小精悍，常由一个有力的领句和一个爆发性的和句构成。领部通常是高亢的指令如“嘿！上来咯！”，音调突兀而上扬；众人的和部则以炸裂般的重音“嗨哟！”回应，节奏突兀、顿挫分明，音乐形态完美模拟了网具脱离水面那一瞬间集体发力、短促激烈的动作特性。《竖桅号》则不同，其过程需持续用力，故号子节奏相对沉稳，领与和的交替频率较慢，乐句气息更长，力度饱满而均匀，体现出一种稳步攀升的力量感。《摇橹号》最具行进感和循环性，其领部旋律稍显悠长，用以调节呼吸；和部的应句“哎嗨一哟嗨哟”则严格对应橹桨入水、划动的周期，节奏规整，循环往复，驱动船只平稳前行。《掌篷号》的音乐则灵活多变，领唱者需根据风向和指令即兴发挥，旋律句法自由；众人的应和则根据拉拽缆绳的节奏而定，强拍突出，展现了劳作中应对变化的协作性。而《发财号》因其洋溢着喜悦，音乐上常突破单一劳动节奏的束缚，旋律线条更起伏婉转，领唱者常加入即兴的、带有祝福意味的唱词，众人的和声也更显欢快流畅，一扫疲劳感，充分体现了渔民在收获时的豁达乐观精神^①。

（二）音乐本体的海洋性特征

1. 节奏律动：“应浪合桨”的节奏型态。长岛渔号“应浪合桨”的节奏律动，是其音乐本体与海洋劳作深刻同构最显著的体现。这种节奏绝非抽象的艺术创作，而是完全服务于、并诞生于具体的生产实践，其首要特征是律动与劳动节拍的严格同步。例如，在需要集体猛力拉拽的“上网号”中，节奏呈现出沉重的顿挫感，每一个强有力的重拍都精准地指挥着全体船员在同一个瞬间发力，以确保渔网稳定上提；而在需要持续均匀用力的“摇橹号”中，节奏则转化为循环往复、均匀平稳的律动，以此匹配橹桨入水、划动的周期性动作，保证船只匀速前进。与之相比，“竖桅号”的节奏则充满爆发性的张力，其律动在起桅的关键时刻极为短促、强烈，集中调动所有力量应对最吃重的环节。这种绝对的同步性，使渔号节奏成为海上集体劳动的呼吸与脉搏。

更进一步，这种节奏律动还与自然力量深度融合，形成号子节奏与海浪节奏的呼应，并外化为强弱分明的力度变化。“号头”善于观察环境，其领唱会本能地顺应海况。在“掌篷号”中，当狂风袭来需要迅速调整船帆角度时，领唱节奏会变得急促而响亮，众人的应和则爆发出雷霆般的强力度合唱，以集体的声浪对

^①刘良忠：《非物质文化遗产渔民号子保护、传承与发展——以长岛渔号为例》，《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2018年。

抗自然的风浪,力度对比极其鲜明;而在风平浪静后唱起期盼丰收的“发财号”时,整体节奏轻快明朗,力度变化充满欢快的跳跃感,仿佛映射着平静海面上跃动的波光。这种基于劳动作业与海况的即时互动,使得渔号的节奏充满了原始的生命力和情景化的艺术感染力,是人与自然动态关系的生动音响写照^①。

2. 旋律音调:“喊风斗浪”的旋法特征。长岛渔号的旋律音调深刻地体现了其海洋出身,呈现出一种“喊风斗浪”的鲜明旋法特征。其核心并非追求优美流畅的歌唱性,而是为了实现指令的清晰传达和力量的高效凝聚,因此多由呼喊性、口语化的短小乐句构成。这些乐句通常由一个或几个强有力的词汇发起,如“哎嘿”“呦嗨”,其形态直接源于劳动中的吆喝与命令,极具实用性和爆发力。它们不像艺术歌曲的乐句那样绵长发展,而是像一个个简短而清晰的口令,在嘈杂的海风浪涌中能被迅速识别和响应,确保了集体协作的即时性与准确性。

受限于其功能性诉求与“喊唱”的发声方式,长岛渔号的音域相对狭窄,多围绕一个核心音展开。旋律不作大幅度的上下翻飞,而是以一个骨干音(通常是调式主音或其上方五度音)为稳定基础,其他音符围绕其进行近距离的波动和环绕。这种狭窄的音域使得所有船员,无论嗓音条件如何,都能轻松地加入应和,保证了集体声响的统一和力量感。整个音乐进行仿佛被锚定在大海之上,稳固而坚定,所有旋律的波动都在一个可控的、集中的范围内,象征着人类在浩瀚自然面前凝聚核心力量以保持稳定的生存智慧。

尽管音域不宽,但其旋律线条却充满动力,表现为简朴、粗犷的线条和多用的四、五度跳进。这种旋法极少有平滑级进的委婉,更多的是直上直下、棱角分明的音程大跳。这种跳跃模仿了身体的发力动作——下沉积蓄力量后向上向外猛然迸发,音响效果极具冲击性。同时,这种由四、五度跳进构成的波浪型旋律线,恰好模拟了海浪的起伏形态^②。旋律的上升对应着拉起渔网、对抗浪涛的奋力,旋律的下行则仿佛船只落入波谷或力量的短暂回落,使音乐与劳作者的身体律动及周遭的自然环境形成了高度的同构,生动地刻画出与风浪搏斗的惊心动魄之感。

3. 唱词与唱法:“俚俗直白”的声腔艺术。长岛渔号的唱词是其海洋生活属性的直接记录,呈现出即兴性强、源于生活的鲜明特质。它绝非书斋中的雕琢之作,而是全然服务于当下劳动情境的“活”的语言。其内容大致源于三个方面:一是直接的劳作指令,如“哎嘿——抬起来呀!”“用力拉呦!”;二是对所见景象的白描,如望见岛屿时唱“瞅见山喽喂”,发现鱼群时喊“东南风呀,哎哟,鱼来了呀!”;三是质朴的情绪抒发,或为鼓劲,或为解乏,甚至夹杂着简单的调侃。这些唱词语言极其质朴,不加任何文饰,完全采用渔民日常的口语方言,充满了生活气息与现场感。这种即兴而质朴的歌词创作,使每一次演唱都是独特的,真实反映了劳动现场的即时状况与渔民们的心理状态,是其“劳动之歌”本质的最直接体现。

与这般质朴唱词相匹配的,是一种为适应海洋环境而生的高亢喊唱发声法。在辽阔海面与风浪咆哮声中,任何轻柔美声都将被吞没。因此,渔号的唱法绝非追求圆润甜美,而是追求极致的实用功能:穿透力与号召力。渔民们全然运用真声,甚至是一种基于真声的强力喊唱(或称“吼唱”),凭借充沛的肺活量与丹田之气,将声音从喉咙深处迸发出来。这种唱法迫使声音变得锐利、集中、高亢嘹亮,像利剑一样刺破海风的阻隔,确保在嘈杂环境中清晰地传递到每个船员耳中。这造就了长岛渔号粗糙、沙哑却无比震撼人心的音响效果。那领唱者如号角般穿透性的呼喊,与和者雷霆万钧般的回应,共同形成一种极具压迫感的声浪,这声浪既是高效的生产指令,更是凝聚士气、彰显人类与自然力量勇敢抗争的精神呐喊。

4. 结构形式:“一领众和”的应答式结构。长岛渔号“一领众和”的应答式结构,是其音乐组织形式的核心,绝非简单的演唱分工,而是一套精密高效的海上生产指挥系统。“领”部由经验丰富的“号头”担任,其功能远超出歌唱范畴,更近乎一位现场指挥官。号头须具备极高的即兴能力,他的领唱并非固定唱词,而是根据海况、劳动强度、作业进度即兴呼喊出指令性、提示性或激励性的短句。他必须目光锐利,准确把握发力时机,通过音调的高低、节奏的缓急,精准地指挥全体船员何时用力、如何配合。这一声部充满了变化与不确定性,是渔号中智慧的体现,时刻引导着劳动的方向与节奏。

①赵缙、赵莹:《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区隔与空间生产》,《文化遗产》2025年第2期。

②曲建鹏:《长岛渔号》,《走向世界》2017年第18期。

与之呼应的是“和”部，即全体船员的齐声应和，这是力量的汇聚与执行环节。相较于领部的自由，和部节奏极为固定、旋律简洁、铿锵有力。所有船员在听到号头的指令后，以整齐划一的吼声作出回应，并在同一节奏点上迸发力量完成机械动作。这固定的节奏型如同生产中的“口令”，将个体的力量瞬间凝聚为集体的磅礴合力。其歌词多为“嗨哟”“嗨嘿”等语气词，强化节奏而非语义，使劳动者能够将全部气息与精力集中于体力输出上。一领一和之间，完成了从指令发出到动作执行的无缝衔接^①。

这种短小精悍、可自由反复的乐段结构，完美适应了海洋劳动的实际需求。单个号子的乐句短小，结构方整，便于记忆和快速响应。更重要的是，其结构是开放性的，一段号子可以根据劳作时间的长短，进行无数次循环反复，劳动不停，号声不止。这种灵活性使得音乐与劳动过程完全同构，劳动时间决定了音乐的长度。整个结构就像一个高效的机械齿轮，领部是主动轮，和部是从动轮，两者咬合联动，将声波的节奏动能直接转化为劳动的身体动能，成为驱动渔船破浪前行的无形引擎。

（三）本章小结——音乐形态与海洋劳作的深度同构

通过对传统长岛渔号音乐本体的细致剖析，其音乐形态并非独立存在的艺术创造，而是与海洋劳作过程形成了一种“深度同构”的关系，即音乐的每一个核心要素都精准地对应并服务于具体的生产环节与海洋环境。这种同构性是其最本质的艺术特征。无论是“应浪合桨”的节奏律动、“喊风斗浪”的旋律音调，还是“俚俗直白”的唱词唱法，都无法脱离“海”与“劳”这两个核心要素进行孤立解读。它们的形成，是声音艺术对生存挑战最直接、最有效的适应性回应，是海洋环境与人类生产活动在声音维度上的高度凝练与投射。因此，长岛渔号的音乐，本质上是一种“功能性的声音”，其审美价值深深植根于其强大的实用价值之中。

这种深度同构具体体现为一种严密的系统性对应。“一领众和”的应答式结构，是海上生产指挥系统与集体协作模式的声音镜像；那与海浪起伏暗合的节奏力度变化，是人体运动节律与自然节律相互作用产生的声响；而那高亢嘹亮、以真声喊唱为主的发声方式，则是为了克服海风海浪的噪声干扰，实现远距离有效通信的必然选择。本章的研究证实，长岛渔号是一个高度理性、高度组织化的声音系统，其形式严格受限于其内容与功能。正是这种与生产劳动血肉相连的特性，赋予了它一种超越了纯粹形式美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它让我们听到的，不仅是音乐，更是一部用声音记录的海洋渔业史诗，是劳动者用身体、汗水与智慧谱写的，与大海的对话。

三、从“海上号令”到“舞台非遗”——长岛渔号社会功能的变迁

（一）传统语境下的原生功能

在传统帆船渔业时代，长岛渔号绝非为艺术而生的表演，而是维系生产、保障生存的“海上号令”，其社会功能首先体现为至关重要的指挥协调功能。在机器轰鸣尚未响彻海面的年代，辽阔而嘈杂的作业环境中，视觉信号极易被风浪遮蔽，声音便成为唯一有效的指挥媒介。经验丰富的“号头”如同乐队的指挥，通过渔号的高低、缓急、长短变化，向全体船员发出精确的指令。每一次领唱，都明确指示着拉网、摇橹、起锚等具体动作的发起时机、力度和节奏。这使得分散在甲板各处的劳动者能够听令而行，统一步调，将个体的力量有序地整合为集体的合力，极大保障了复杂、高危海上作业的安全与效率。可以说，渔号是生产流程中的“有声操作规程”，其节奏就是生产的生命线。

其次，渔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动能输出功能，它是一种直接作用于劳动者身体的“生物力学引擎”。高强度、重复性的集体体力劳动极易导致呼吸紊乱、肌肉疲劳和意志松懈。渔号“一领众和”的节奏结构，巧妙地调剂了劳动者的呼吸：在“领”部时，众人得以短暂蓄力、吸气准备；在“和”部时，则伴随发力动作猛烈呼气、呐喊出声。这种有规律的呼吸模式确保了氧气的有效供给，延缓了体力衰竭。同时，那铿锵有力、重复循环的节奏具有极强的感染力，能有效激发劳动者的身体潜能，调动其神经系统兴奋度，使其在单调的劳动中保持专注，将身体机能调整至最佳输出状态，从而减轻疲劳感，将艰苦的劳作转化为富有节奏和效率

^①杨静：《山东“长岛渔号”音乐特征及演唱风格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的生产活动^①。

最终,在上述实用功能的基础上,渔号更深层次地孕育出一种强大的精神凝聚功能,于茫茫大海上构筑起一个牢固的“命运共同体”。在瞬息万变、危机四伏的海洋面前,个体的力量微不足道,唯有绝对的信任与协作才能共渡难关。那一声声呐喊与齐声回应,不仅是力量的融合,更是精神的共鸣与情感的纽带。它消除了个体的孤独与恐惧,在重复的呼应中强化了船员间休戚与共的协作与信任关系。共同的号子声标志着他们是“同舟共济”的兄弟,共享同一种节奏、同一种呼吸、同一种命运。这种由共同劳作和共同声音塑造出的强烈归属感和集体认同感,超越了简单的生产协作,升华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着渔民们以集体的姿态去对抗自然的严酷,从大海中夺取生存的给养。

(二) 社会变迁下的功能转型与拓展

随着机械化渔船取代传统风帆、现代导航技术消弭海上风险,长岛渔号赖以生存的原生劳动语境逐渐消散。然而,它并未随之消亡,而是在社会变迁中成功实现了功能的现代性转型与拓展,其核心从“实用主导”转向“文化象征主导”。首要的转变是其文化标识功能的凸显。渔号不再是海上的生产指令,却升华为长岛乃至山东海洋文化的“音乐名片”与声音图腾。它那高亢嘹亮、节奏鲜明的独特声响,让人联想到渔民搏击风浪的壮阔图景,成为一种无可替代的地域文化符号。在各类文化宣传、对外交流和非遗展示中,长岛渔号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海洋文化元素被反复呈现,其价值从内在的实用价值转化为外在的、被广泛认同的文化象征价值。

剥离了沉重的体力劳动负担后,渔号的艺术审美功能得以纯粹地释放,实现了从劳动工具到舞台表演艺术的华丽转身。经过适度的艺术提炼与编排,它从嘈杂的生产现场走进了音乐厅、剧院和电视荧幕。观众的关注点不再是其指挥劳动的效能,而是其本身作为民间艺术的独特魅力:那充满原始张力的“一领众和”形式、粗犷豪放的唱腔,以及与海洋意境完美契合的音乐风格,均成为被欣赏、被品味的审美对象。这一转变使其受众从单一的劳动者扩展到广大社会公众,其艺术价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珍视与挖掘^②。

为确保其生命得以延续,长岛渔号被系统地纳入现代教育传承体系,承担起新的教育传承功能。它通过“非遗进校园”、“民俗传习所”等形式,进入当地中小学及社区的课堂,成为乡土教育和文化认同教育的重要载体。青少年通过学习传唱渔号,不再是学习如何出海捕鱼,而是了解和感知祖辈的生活智慧与精神世界,从而在心底播下热爱本土文化的种子。这一功能将渔号的传承从以往“口传心授”的自然状态,转变为有组织、有目的的文明传递活动,使其在新的代际中焕发生机。

最终,在文化消费兴起的时代背景下,长岛渔号衍生出显著的旅游与经济功能。它成为长岛文化旅游的核心展演项目之一,在渔民节、海鲜节,以及民俗旅游村的舞台上,为游客提供原生态的文化体验。这种展演不仅丰富了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提升了地区吸引力,更通过演出报酬、文创产品开发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了经济效益,反哺着传承群体与保护工作。至此,长岛渔号完成了其功能的现代化涅槃,从一种谋生手段,演变成为一种能够创造社会与经济效益的文化资源。

(三) 功能变迁背后的现代化进程与文化调适

长岛渔号社会功能变迁的剖析清晰地表明,其从“海上号令”到“舞台非遗”的转型,绝非一个孤立的、偶然的文化现象,其背后深刻地折射出中国社会宏大而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进程以渔业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为核心驱动力:机械化渔船的普及、现代化导航与捕捞技术的应用,彻底瓦解了传统集体协作、人力驱动的海上劳作模式。这使得渔号指挥生产、激发动能、保障安全的原生实用功能失去了存在的物质基础与技术必要性,其作为“生产工具”的属性迅速褪色。与此同时,城镇化、人口流动以及新一代渔民价值观念的转变,进一步加速了其原生文化语境的消解。因此,长岛渔号的功能变迁,首先是现代化浪潮冲击下,传统生计方式被现代技术文明替代的必然结果,是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时代产物的重新定义与安

^① 苏进静:《“非遗”视角下的鲁浙两地渔民号子对比研究》,浙江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② 王睿璇:《非物质文化遗产海洋特色初探——以周戈庄祭海、涉海民间传说和渔家号子为例》,《中国民族博览》2022年第18期。

置,体现了社会进步所带来的深刻文化嬗变。

然而,功能的变迁并非意味着文化的消亡,恰恰相反,它展现了长岛渔号作为一种活态文化遗产强大的文化调适能力与社会韧性。面对生存土壤的巨变,它并未僵化地固守原初形态,而是积极地顺应新的时代语境,进行了创造性的功能转型与价值重构。这种调适的核心策略是从“实用”向“象征”的跃升,即将其核心价值从工具性转向表征性。它通过承担文化标识、艺术审美、教育传承与旅游经济等新功能,成功地融入了现代社会的文化图景与价值体系之中。从更深层次看,这种调适是文化主体(传承群体与社会)为守护自身文化根脉而进行的主动选择与实践,旨在为“无用之用”的古老遗产寻找新的“用处”和生存空间。它揭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生存法则:唯有与当代生活建立新的、有效的连接,实现功能性的现代转化,才能获得延续的活力^①。

结 语

长岛渔号从浩瀚大海走向聚光灯下的舞台,其功能变迁是一部浓缩的社会发展史。本研究阐明,其音乐形态是海洋劳作的生命律动,而其社会功能则随生产方式和文化语境动态演变。功能的多元化拓展是其生命力在当代的延续,但也伴生着本真性流失与传承断层等挑战。未来的保护工作必须在“变”与“不变”中寻求平衡:既珍视其作为“音乐化石”的历史原真性,又鼓励其作为“文化基因”进行创造性转化。唯有如此,长岛渔号古老的声波才能超越时空,在未来持续回响。

The Music Form and Social Function Changes of Long Island Fishing 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ine Culture

JIANG Fang-zhou¹, ZHANG Yi-ning²

(1. College of Music, Bangkok Thonburi University, Bangkok 10170, Thailand;

2. Quzhou College School of Education, Quzhou 324000,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first analyzes the isomorph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u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ong Island fishing vessel, such as the rhythm of “responding to waves and combining oars” and the structure of “one leader and many followers”, and its marine labor field. Subsequently, it is emphasized that with the modernization of fishery production methods, the core function of the Long Island Fishing Ship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coordinating and commanding labor, inspiring power as a “maritime command”, to undertaking symbolic functions such as cultural identity, artistic aesthetics, educational inheritance, and tourism economy as a “stag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is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profoundly reveals the adaptability and adjustment path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providing useful academic thinking for its dynamic inheritance.

Keywords: perspective of marine culture; Long Island fishing vessel; musical form; social function

[责任编辑 山阳]

^①吴建垲、马知遥:《非物质文化遗产视域下乡土文明的层次化构建》,《山东艺术》2019年第5期。